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現在爭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陣營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們強大的同盟軍。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 資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民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瘋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經濟危机。現在打原子弹，时期会縮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講講這個問題 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來建設，从此就不会再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要睡覺。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是死人。打仗死人我們見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兩晉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断断續續几百年，三国兩晉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兩千万，以后到唐玄宗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祿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兩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統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講过，我說現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長的大刀厉害，他不信。兩次世界大战死人並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二千万，我們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哪！原子弹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計劃就发展起来，換來了一个資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高崗那样不顧大局，党就要分裂，就会出現不平衡，虽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是平衡。中央委員

更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要跌跟斗。……凡不顧大局鬧分裂的，有什么好結果？張國燾鬧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鬧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象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寧才和他們絕裂。我們要作合法斗争，爭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顧大局。

我們是要調動六亿人民的力量，連右派我們都要做工作，分化他們，使右派十个人中有七个人改好。經過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們方面。摘掉右派帽子，再搞右派，再給他戴上。

### 第三次講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 (一)再講破除迷信。

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搞了四十一个发明家的小傳，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貧苦的或工人出身，或农民出身的。瓦特就是工人。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紀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除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門都可以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再講講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現的問題。这个問題很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一些人，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不是平等待人，靠老資格吃飯，特別是做了大官的，

靠做大官吃饭，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提出这个问题，要靠大多数人做到这一点，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好多官僚主义者，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碍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 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的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除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谦虚（科学的谦虚），就可以防止，出现了也不怕。

（三）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去年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复，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的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唱青衣，而且角就有青衣、花旦、武旦、老旦、丑旦五行。五行，梅兰芳只会一行，唱老旦不行，他唱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二、三

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讲还有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它行业也应该知道一些，摸一摸，略熟几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是必要的。但是要熟得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是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他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自己不起，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的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插红旗，辨风向。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的，凡是有入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的旗子，就是资产阶级的旗子。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夺。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机关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是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应当到落后的地区走一走，发动群众把红旗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这是低级趣味，

虛偽的謙虛，閉口道士不吹吹打打，這種謙虛應當批判。有這樣一種社會輿論，獎勵這樣一種作風：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說敢做。這是從儒林外史那裡學來的。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覺，學會辨別風向，看刮什麼風。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是蘇州姑娘林黛玉講的。世界上總是分黨派的，社會上的人總是分左中右三種，有的处在先進狀態，有的处在中間狀態或後退狀態。現在的任務就是先進分子爭取中間狀態的人，讓他們站到左边來，即插起紅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資產階級的旗子。中間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劉知几說，寫歷史要有才、有學、有識。識不是指知識，是指關於看到風向。我們要特別注意，要善于識別風向，要有識別力。識別力有其極端的重要性。儘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學問，但對識別風向很遲鈍。斯大林講，要有預見性。預見性是指的辨別風向，刮小風時就知道要刮大風。站在看台上，什麼東西看不到，是不好的。沒有預見性，已經相當普遍存在了，還看不到，這種狀態給右派以可乘之機，你看不到，他就來了。

不要怕插紅旗，凡應該插紅旗的地方趕快去插。每一個山頭、村落，都要把紅旗插起來。每個党委、機關、部隊、工廠、合作社，都應該把紅旗插起來。那裡沒有紅旗，那裡就要插。現在許多地方並非都是紅旗，參差不齊，有的剛剛插起紅旗，又落後了，不紅了。經常變化，這也是自然狀態。旗子變了，要常換。

紅白喜事。上次講對付可能的災難，主要講的戰爭和黨內分裂。災難有大、中、小。我講的是大的：戰爭、分裂。

中國人民把結婚叫紅喜事，死人叫白喜事，我看很有道

理。中國人是很懂得辯証法的。結婚可以生小孩，母親分裂出小孩來，是個突變，是喜事。一個人分裂出三個兩個，甚至十個八個，象航空母艦一樣。

新事物的發生、變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開个追悼會，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覺得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講辯証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有災難是社會現象，自然現象。突變是宇宙最根本的規律，生是突變，死也是突變。由生到死几十年是漸變。假如蔣介石死了，我們都會鼓掌，杜勒斯死了，我們沒有掉淚的，这是因为舊社會事物的死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產生是好事，新事物的死亡當然不好。如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失敗，我們南方根據地的丟失，等於現在的苗子被霜子和暴雨打掉，這當然不好，這就發生補苗的問題。我們共產黨人是希望事物變化的，所謂躍進，就是和過去不同……突變優於量變。沒有量變，不可能突變。沒有量變不行，否定量變就會走上冒險主義。平衡的破壞是躍進，平衡的破壞優於平衡，不平衡大傷腦筋是好事。如一機部、冶金部、地質部等日子不好過，大家壓它壓得很緊，都要大大發展，這是好事。平衡、量變、團結是暫時的、relative的，不平衡、突變、不團結是絕對的、永遠的。許多不團結被克服成為團結。團結任務的提出就是因為不團結。一個人團結了，兩個人就有不團結。我們黨有一千二百萬黨員，各種出生的人，要常開會就團結了。所以年年講團結，就是因為年年有不團結。每人想法不同，黨員水平不同，就必須開會。常任代表制搞對了，過去沒有每年開一次代表大會的制度，開別的會，現在

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較合理的意見採納了，会上做出決議，作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會議有些地委、县委書記參加，使我們的會更好了。他們講了許多好的意見。

不仅年年要講團結，每天都要講團結，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細胞分裂，新陳代謝，旧的不死对小孩的发育不利。新陳代謝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長江后浪推前浪，事物都是变化的。現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沒有这么多，是后来变来的，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二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轉化到它的反面。我們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争，有受批評的。湖北省有哥妹倆貼大字报。哥哥老資格，有官气。真理在妹妹手里，結果哥哥輸了，妹妹贏了。浙江父亲儿子爭論密植，儿子贊成，父亲反对，結果父亲輸了，儿子贏了。这是一般規律。做父亲、哥哥的总有相当危險就是了，也沒大关系，向妹妹、儿子認輸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現，免于危險。

防止可能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我們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張國燾，四是高崗，另立中央垮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傾路綫是以合法形式出現的，我們对他是採取治病救人，經過批評达到團結的态度。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可能有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們的办法是團結、批評、團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样講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講了才舒服，不要迷信，講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在搞分裂嗎？还有美国

的福斯特。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張國燾、高崗搞分裂，最近有李峯、沙文汉、李世农、孙作宾、陳再励……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統垮了，文艺系統垮得多。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象細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團結，月月有團結，象細胞生長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沒有了，現在可以用莫斯科會議的形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約，苏联为會議召集人，有事开会。

設置对立面，有两种。

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存在，放不放是政策問題，我們决心放，大鳴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劳动人民起来与他們辯論，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員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佔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帶有物質条件，如修水壩，可以用人为办法設置对立面。抬高水的位置讓它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設置对立面，鞍鋼是日本人修的，長春汽車厂是新的，是人工設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沒有的，可以人为的制造，但要有物質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規律就上去了。

我們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現象。……陈独秀、罗章龙、張國燾、高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兩次王明路綫，内战时期三次“左”傾路綫教育了我們党。这許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人为的造陈独秀、高崗也不必要，要有一定的气候他才出来。沒有什么可怕，要克服他們。

乐观主义是我們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

大家能不发急？我就有点着急，着急就要想办法，要講領導艺术，領導的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預見到，也可使之不发生，象鋤草一样。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有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更高的觉悟是能有預見性。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戰爭取不打，但打也不怕。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錯誤的要讓他改过，如潘××。現在我們很團結，沒有什么事，中央地方都很好，反冒進的东西現在搞清楚了，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擴大一點講，我們是樂觀主義者，使大家自覺起來，有所准备。

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放到第一位也好，以虛帶實，以政治帶業務，以紅帶專，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兩個口号缺乏辯証法，講技術决定一切，政治呢？講干部决定一切，羣眾呢？列寧講得好，蘇維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苏維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政治業務結合，就产生共产主义。政治与業務是对立的統一，但它倆結了婚，就会产生儿子。

## 第四次講話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我們的大会是有成績的，开得好，做了認真的工作，制定了我們的总路線。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認真，一認真，不管什么困难，就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最大，人民羣眾得到了解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設有很大发展。这些已經使我们

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們在世界上沒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不把我們看在眼里。这和我們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表現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國、美國，杜勒斯就得看上眼，承認確實有这个国家；我們的方針，这个客人我們不請，那时你找上门来，我們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对总路線。多快好省的方針，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觀存在的。这許多人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不到要經過曲折才能看到，經過一个時間，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总路線，还要在客觀實踐中證明。过去有些已經證明了。过去三年是馬鞍形，兩头高，中間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次会就开好了。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情緒、要求、干勁。多快好省建設社会主义，應該說是反映了。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不够，沒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六年冬季，有兩件事沒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現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們党。國內沒有料到来了个反冒進，沒有料到来这兩件事。成都会議上就說過，請到會的同志注意，將來還可能發生曲折，請各省委研究要預先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講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預料到了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分裂……

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了。并非現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瘋子，在莫斯科會議上就講過，要防備瘋子，宣言說打起來，他就完蛋，見解是我們的。會出亂子，但是不正確的力量總要被批判，正確的力量總要勝利，但是要預料到，黨內也想一想，那麼多省、市委、自治區，一半以上出了問題，但卻沒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出過問題。這是階級鬥爭的正常現象，有些是屬於好人犯錯誤，如對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壞人混進黨內來，××是壞人犯了錯誤，……丁玲是暗藏在黨內的壞人，早已叛黨。

跟什麼人走的問題。首先跟什麼人？首先是跟人民學習，跟人民走。人民里頭这么多干勁，多快好省，許多發明創造，一类社，千斤產，兩千斤產，工業方面，突破定額，發明創造。總之，工業、農業、商業、文教、軍事各方面，思想理論各方面，有各種人材，代表人民的。大會講了這麼多經驗，要我講，講不出來，你們講的比我的好，是正確地反映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據這些正確的反映，制成為較完整的體系，如這次大會的決議和報告。過去沒有這樣。經過這八年，特別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六年大發展，以後來了个大波動，一九五七年是馬鞍的低部。一九五七年三中全會的鼓勵就給了全黨、全國人民比較明確的方向，經過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大跃进，又經過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会議，給這次大會作了準備，寫了總結、決議。又搞了六十條，還沒完成，還要改寫，大體意思搞出來了，過幾個月再改寫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

我們。首先是理論來自於實踐，然後理論來指導實踐。理論與實踐統一是馬克思主義。开头沒什麼馬克思主義，因為有了階級鬥爭的實踐，反映到了人民的腦子里，才首先反映到先覺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腦子里，客觀規律反映到主觀世界，才有了理論性的總結，由他們發展為理論，給我們作模範。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錯誤，就要理論指導實踐，但理論又必須從實踐中得來的。離開客觀實踐就不可能製造出理論體系來，關着房門不可能造出什麼實際來。大會的總路線的制定不可能是某些個人突然想出來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注意下去聯繫人民，或者同與人民有聯繫的干部、人民中的積極分子接觸，只要你半年不與人民接觸聯繫，什麼也不知道，就貧乏了。所以規定每年四個月下去是很有必要的，下去聯繫人民，同與人民有聯繫的干部、人民中的積極分子接觸，了解他們想些什麼，做些什麼，經過什麼艱苦，總結上來。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口號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勁。干勁用“鼓足”二字比較好，比“鼓起”好，眞理有量的問題。因為干勁早鼓起來了，問題是足不足，至少要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較好，干勁各有不同，“鼓足干勁”這一句話是新話，“力爭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話。……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外國人看來不好懂，好象不通，沒有主詞，本來想加一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當主詞，現在想不要也行。六億人民就是主詞，六億人口中絕大多數人的干勁。除了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這些人的干勁可能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就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个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吹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象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个报导，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南宁、成都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們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專門泄气，是那方面的干勁，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勁，南斯拉夫綱領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风，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好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貧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說：“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 在八大二次代表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写明

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沒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来人造卫星的齐奥尔柯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副业，慢慢搞成专业了。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人，不知道。

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不行。

白蝴蝶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初中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

中国古代楚人卞和（即和氏璧的和氏），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胫，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胫。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抱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剖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

富兰克林是个牧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性，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就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个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得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吹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象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个报导，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南宁、成都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风，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好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 在八大二次代表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写明

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来人造卫星的齐奥尔柯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副业，慢慢搞成专业了。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人，不知道。

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入学问多了，不行。

白蝴蝶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初中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

中国古代楚人卞和（即和氏璧的和氏），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胫，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胫。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抱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剖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

富兰克林是个牧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性，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

不是洋人？大家答复都是否定的，他們就有迷信。

兩次講話，一是破除迷信，二是講国际国内形势，第三是講灾难。

國際形势总的說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

國內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問題。农民是同盟軍，不抓农民就沒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問題，就会犯錯誤；有了这个同盟軍，就会胜利。列寧也是很強調工农民主專政——使农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有八十年時間发展資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證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不需要几十年的間歇，苏联二月革命證明列寧是正确的。

中國則更不同，我們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根据地的經驗。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不懂得农民問題的重要性，跌跟头还是在农民問題上。不相信多快好省者，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为什么講十大关系？十大关系是基本觀點，就是同苏联比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工业、农业同时并举。不提和苏联比，但实际上是和先生比。我們有两个生身父母：一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綫，阶级斗争是学列寧的。对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包括思想在內），但不沒收，人不灭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綫，搞恩賜觀點，阶级斗争又过分。

国内形势主要是农民問題。

水、肥、土、种、密，深翻地，長葛县的办法是一个典型。

我主張重工业、冶金、机械、煤炭、化学、外贸都要講一下，宁可迟一天閉会。

二十六个省市区，十三个发生問題。政法系統、文艺系統很乱，是全国性的。兩种：一种是右派分子，一种是右傾机会主义。犯路綫錯誤的，允許革命。对于潘汉年、古大存、馮白驹，这次會議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确的，不处理也对。

有几个文件印一下：王明和董西寧的講話，天津一个支部書記和南京大学党委書記（給主席）的信。

天津支部書記很好，沒有軟下去，因为过去未告訴那么多人，放不放，在那时是跟不上的。清华大学爛掉一个支部，清党找不到这样的机会，有了时机。

还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語印一下。其中講所有制基本解决就对了，但在相互关系即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沒有解决。估計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基本胜利，是有点过分乐观，料不到还要搞这样の大革命。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估計会有斗争，要有長期的斗争去肃清资产阶级及其知識分子深厚的影响。單獨一場政治戰綫思想戰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免不了的，在所有制問題基本解决之后，必須另搞一次。这次，这場革命沒有料到几个月就根本解决，整风提前也沒有料到。当时的整风，是由于形势逼着而来的，同资产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但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借右派之力来整风，我是自觉的，放出来再想办法，斗几下再說。青島會議印成了一个材料，华东师范大学一个学生很坚决，提出：共产党倒了怎么得了？

上面講的是农民問題。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

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沒有感染我們，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羣众，就看不到好東西。潘汉年等，你說他們在农村沒有搞過嗎？就感化他們不了。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屬只有四千万，无论如何沒有五亿农民那么多。富裕农民不跟我們走的有几千万，經過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定的百分之二十。

选举有什么意見？

头上不長角不好，多了不好，牛長兩只角正好，四个就多了。候補委員選一批就平衡了，候補委員多几个也沒有問題。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罵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說我是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寧也強調农民問題，也是农民主义嗎？我和欧洲同志談，你們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自耕农（許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洲和印度同志談，也是談爭取农民問題，要他們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大跃进不要太紧，紅專学校学生上課都打瞌睡，这怎么行？中央苏区二次“圍剿”两个星期打五次仗很少睡觉，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突击。要注意不要太紧。

协作区如何搞？是否定之否定。

大会后休息一天，再开兩天会，每省一个，中央若干人参加就行了。

八月五日再开会，你們有兩個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教、军队。現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调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問題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講，无时间就书面印发。这次會議的发言印一本叢書，事实上是自己評比，許多好經驗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可到那里开一次現場會議。

深翻学長萬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記者說，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勢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語言。如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詞，苏联、英美等国家的讀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我們就和外国的讀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謂夷狄之邦。到了滿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变了奴隶，感覺不行了。从前驕傲，現在又太謙虛，來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鋼，后年一千七百万吨，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中央一年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兩次大檢查，小抓四次。

看到农民瞞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們有。

森林下放，地方包干。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長竹子，不知什么时候起。

# 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紀要

(一)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最高国务會議，二月开了一次，現在是九月，六个月沒有开了。二月那次会上，我們談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講了个大有希望，不曉得同志們記得不記得？我还比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講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羣众中出現。我們在座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許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們跟国民党相反，他們是以一个貴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現。

那一次講了几句不好听的話，批評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过去，迷信將來。”你說是坏的，我說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嗎？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評語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过去，迷信將來，岂有此理！”我說，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評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專政这三門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簡直就不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怎么分析呢？有資產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兩种好大喜功。有資產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攀鑿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資產阶级的一类。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調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問題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講，无时间就書面印发。这次會議的发言印一本叢書，事实上是自己評比，許多好經驗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到那里开一次現場會議。

深耕學長葛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記者說，一百年后中国占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勢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語言。如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詞，苏联、英美等国家的讀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我們就和外国的讀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謂夷狄之邦。到了滿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驕傲，現在又太謙虛，來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鋼，后年一千七百万吨，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國，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國。

中央一年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兩次大檢查，小抓四次。

看到农民瞞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們有。

森林下放，地方包干。

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長竹子，不知什么时候起。

# 在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紀要

(一)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

最高国务會議，二月开了一次，現在是九月，六个月沒有开了。二月那次会上，我們談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講了个大有希望，不曉得同志們記得不記得？我还比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講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羣众中出現。我們在座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許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們跟国民党相反，他們是以一个貴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現，我們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現。

那一次講了几句不好听的話，批評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过去，迷信將來。”你說是坏的，我說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嗎？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評語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过去，迷信將來，豈有此理！”我說，恰好是有理，不是豈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評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主义政治經濟学、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專政这三門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簡直就不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怎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兩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孌孌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

孜孜为利者，資本家之徒也。我們呢？我們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視过去，迷信將來，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視將來，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將來，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視將來嗎？

這六個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坐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腦筋也有变化。有許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講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竟怎么样？比今天的現實还是落后些。

國內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羣众，工人、农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里舒暢，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結果。整风以前我們許多干部有兩条：一条叫官气較多，二条叫政治較少。不是要反五氣嗎？五氣的头一条就是官气。經過整风，沒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現，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們感覺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們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沒有分別，还是压在他們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手表、自行車、鋼筆、收音机、縫紉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許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氣，他們也就自我批判了：我們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干部，县，区，乡干部搞試驗田，跟他們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們

知道是為誰來干事情，是為他們自己，為集體，為全國。這一年的結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產 $\times \times$ ，即有可能從去一年三千七百億斤，增到 $\times \times$ 億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斤，今年大概有 $\times \times$ 萬擔，可以超過 $\times \times$ 。烟葉可以超過三擔，今年大概有 $\times \times$ 萬擔，可以超過 $\times \times$ 。麻類作物，過去四倍。只有油料只超過半倍，還是不足的。麻類作物，過去沒有注意，沒有抓緊。鋼鐵可以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央八次會議，總理在那裡建議，五年計劃搞鋼鐵一千〇五大第一次會議，總理在那裡建議，五年計劃搞鋼鐵一千〇五十萬噸到一千二百萬噸，如果說一千〇五十萬噸，今年就有超過的可能，可能搞到一千二百萬噸。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不是十二年嗎？五六年開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這些都還是一些預計，還要看實際的結果。今年如果搞到 $\times$ 多億斤糧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 $\times \times$ 億斤。明年也許不能搞這麼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還許不能搞這麼多，太搞多了，除了人吃馬喂之外，現在還沒有找到用途，也許會發生問題。但是明年總是可能超過 $\times$ 多億斤，鋼鐵明年可能超過 $\times \times$ 萬噸。總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趕上英國，除了造船、汽車、電力這幾項之外，明年都要超過英國。十五年計劃，兩年基本完成。誰人料到？這就是羣眾的干勁的結果。

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起了變化，并且還在繼續起變化中。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的這個問題，在民主黨派中間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要逐步來，不能很性急。但是派中間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要逐步來，不能很性急。但是派中間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要逐步來，不能很性急。多數人造形勢逼人。形勢就是人，就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多數人造形勢逼人。形勢就是人，就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多數人造形勢逼人。形勢就是人，就是多數人壓迫少數人。我歷來主張對立面的，沒有對立面，誰也不干的。我有什麼對立面呢？在我們人民隊伍里頭有很多對立面，此外還有在我們隊伍以外的“地富反壞右”，這都是對立面。工人農民壓迫我們，

他們說，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比如五年上半年，有許多老百姓也實在不喜歡我們，人人談統購，家家說糧食，那個時候你說糧食沒有危機，我也可以講一個危機。一個原因是因為糧食不足，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富裕中農興風作浪。其中主要是共產黨員，他們是黨員，但是他們當了縣區鄉干部，他們叫“農民苦”。所謂“農民苦”，就是他們苦。所謂他們苦，就是余糧少。據江蘇省的統計，在我們縣區鄉干部里頭，這種人有百分之三十。他們每天叫“農民苦”，說統購統銷太多了，不贊成。這一來，煽起這些農民，本來够吃的，也說不够吃，用各種辦法來吵。這一壓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決心就是那個時候搞起來的。批判各種迷信：什麼解放區合作化不行，什麼沒有會計，什麼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麼漢人可以，少數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這些迷信，沒過幾個月，合作化就搞起來了。然後又影響工商界，敲鑼打鼓，全行業公私合營。到一九五六年那個時候，有些人又覺得恐怕不行了，多快好省也不靈了。同時斯大林問題也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出來了，帝國主義反共反蘇，那麼一個潮流，國內就是右派醞釀活動。經過整風反右，才把這些東西扭轉過來。而現在呢，就轉到一個比較有利的方向，民主黨派也好，科學界的人也好，工程技術界的人也好，資產階級（工商界者）也好，總而言之，絕大多數人，或者已經改變立場，或者正在向改變立場前進，也還有少數人沒有改變的，還有左中右。階級還是存在的。說現在階級不存在了，階級鬥爭已經滅了，這個觀點恐怕是不對的。我說象吃鴉片煙一樣，吃鴉片煙上了癮，是不容易戒的。資產階級思想，還有封建主義思想，

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还要形势逼人，还要看事实。一个長江大桥可以說服許多人，你沒有長江大挾，他就不信。出了个長江大挾，許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鋼，明年××万吨鋼，苦战三年，后年××万吨，糧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亿斤。我还是講个可能性，要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別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減少。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紀律的，軍事化干勁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時間，免得往返，节省糧食，节省柴火，节省經費，此外还节省大批時間。这是××县的經驗。科学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將軍”將得厉害，就是学生將教師，講師、助教將教授，研究員將所長。有那么一个科学科研院所，叫做藥物研究所，設在上海，所長趙承暇有門本領，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藥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講，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們嘯了气，就自己干，結果苦战多少晝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藥来了。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編講义，編教材，編教學大綱，編學生不贏，學生是苦战几晝夜，集体來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編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三十六个人，苦战四晝夜，讀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編了一本文学史大綱。这是形势逼人，就是压迫。青年

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們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就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一般說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們要承認这一条。

国际形势，我們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人現在在我們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門、馬祖，还有什么大担島、二担島、东碇島一起包括进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們的絞索，美國人的領吊在我們中國人的鐵的絞索上面。台灣也是一个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門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們。我那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絞住了。

我現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給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觀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誰怕誰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們也怕打仗。問題是究竟哪一個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請各位拿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觀察觀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觀察下去，究竟还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們东方人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們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們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們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問題，人心的問題。人心就是力量，我們这边的人多一点，他們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

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領的地方相当寬，有三个洲，一个亞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即使这些洲里头有許多統治者还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日本、土耳其、伊朗，可是人民中間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壟斷資本家以及中了他們的毒最深的是主張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資产阶级，他們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們的心比我們虛，我們的心比較实。我們依靠人民，他們是維持那些反动統治者。現在杜勒斯就干这一条，他們專扶什么“蔣委員長”、李承晚、吳庭豔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們比較怕我們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他們結成軍事团体，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馬尼拉，这些团体的性質究竟怎么样？我們講它們是侵略的。它們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現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現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敗了，波蘭也崩潰了，捷克、东德也崩潰了，連苏联也发生問題，我們也发生問題，搖搖欲倒，那个时候他們会进攻的。你要倒了，他們为什么不进攻？現在他們不倒，我們巩固。我們这个骨头啃不动，它們就啃那些比較可啃的地方，搞什么印尼、印度、緬甸、錫蘭，想搞塔納賽尔，想搞塔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

現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的进步。尼克松是个付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

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視“尊严”，沒有“礼貌”了，在他們心目中不算数了。你是我們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那三个軍事团体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是侵略的，但是它并不巩固。

第三条，关于緊張局势。我們每天都是要求緩和緊張局势，緊張局势緩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么，凡是緊張局势就對我們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緊張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純害无益，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緊張局势除去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調动人馬，調动落后阶层，調动中間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門、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沒有料到現在这个世界鬧得这样滿天风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們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闖禍。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現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作“有条件的支撐”。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緊張局势造成的？緊張局势并不取决于我們，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結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觀点列宁說过的。他是講战争，他說，战争調动人們的精神状态，使他緊張起来。現在当然沒有战争，但是，这种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緊張局势也是能够調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問題。英美侵略軍必須撤退。但是帝国主义現在想賴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你要反对侵略者，如果没有个对象，没有个靶子，没有个对立面，这就不好反。他自己現在跑上来当作对立面，并且賴着不走，就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所以，他迟迟不撤退，总起来

看，对人民也不见得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他走，你为什么不走？

第五条，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除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必须得放，放出来毒就消了。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这个东西究竟对我们有利害怎么样？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多作生意，还是少作生意好？现在生意是作，是少作。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〇年反共高潮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可能是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

掉了依附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多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十亿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年就差不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还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是讲总数，不是按人口，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就钢铁来说，要三亿吨，英国五千万人口，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七亿人口，得要三亿吨钢，刚才讲七亿吨钢，要三亿吨钢翻一番还要多一点，那可能要十五年 也许还要多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了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搞了八年，七搞八搞，还只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亿斤，可能到××亿斤。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个体经济，初级合作化，没有整风反右。钢铁也是

一样，几十年只有那么一点，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这还是张之洞遗留下来的。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砌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扯远了，还是回到不承认的问题上来，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他不承认有什么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贯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藥蛋。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想不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

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现在我们要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支，将来要发几千万支，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 (二)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的讲话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古老的绞索，他已经占领几年了。他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人的脖子套住了。中东是最近

套住的。誰人讓他套住的呢？是他自己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讓我們抓到。黎巴嫩也是他自己造的一条絞索，自己套上去，絞索的一端就丢在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罵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是主要是在阿拉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他現在进退兩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結，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灣，他是訂了條約的，和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較活，沒有什么條約，說是一个請，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灣，就訂了个條約，这是一个死結。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訂條約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艦隊是杜魯門。杜魯門那个时候可去可來，沒有訂條約，艾森豪威尔訂了个條約。这边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人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門、馬祖套上了沒有？金門、馬祖据我們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講現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看情形，那时候再决定嗎？問題是十一万国民党軍队（金門九万五，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得关心。这是他們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约旦的侯賽因和黎巴嫩的夏蒙那样好？他們不能見死不救。昨天第七艦隊的总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揮，还有那个斯摩特，不是放大炮嗎？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揮。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嗎？在朝鮮有脱身政策，現

在我看形成了金、馬的脱身政策。他們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輿論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灣是我們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讓步的，是內政問題。跟你的交涉是国际問題。这是兩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鋁，电解銅，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嗎？蒋介石这一边是內政問題，你那一邊是外交問題，不能混为一談。現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占。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軍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沒有駐軍，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亞洲，主要是欧亞非，主力在欧亞兩洲。这么几个点，分得这么散，我們不曉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覺得，它是霸占中間地帶为主。至于我們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亂子，确有把握。一來，我們，苏联、中國全部崩溃，否則我看他不敢来的。除了我們这个阵营以外，它都要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亞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軍事條約上跟他連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的反共好些？所謂真正反共，就是拿軍队打我們，打苏联。我說，沒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調來調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調去，到了紅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馬來亞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它一个新聞記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來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們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灣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較有利；它賴着不走，就讓它套到那里，无損于大局，我們还是搞大跃进。

今年要爭取鋼一千一百萬噸，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萬，爭取××萬噸。后年再搞××萬噸，不是××噸嗎？苦戰三年，××萬噸鋼，那麼全世界除了蘇聯同美國，我們就是第三位。蘇聯去年就是五千萬噸，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萬噸。我們苦戰三年，有可能超過××萬噸，接近蘇聯；再加×年，到××年，可能出八千萬到一億噸，接近美國（美國因為它經濟恐慌，那個時候也許只有一億噸）。第二個五年計劃就要接近或趕上美國。再加×年，×年，搞一億五千万噸，超過美國，變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鋼鐵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糧食，苦戰三年，今年可能是××到××億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億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調了，因為糧食還是要找出路。糧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業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經過酒精搞橡膠，搞纖維，搞塑料，等等。

至于緊張局勢，也許還可以講几句。你搞緊張局勢，你以為對你不利呀？不一定。緊張局勢調動世界人心，都罵美國人。中東緊張局勢，大家罵美國人。台灣緊張局勢，只是大家罵美國人，罵我們的比較少。美國人罵我們，蔣介石罵我們，李承晚罵我們，也許還有一点人罵我們，主要就是這三家。英國是動搖派，軍事不參加，政治上聽說他相當同情，因為他有個約旦問題。你不同情一下，美國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國在約旦怎麼辦呀？尼赫魯發表了聲明，基本上跟我們一致的，贊成台灣這些東西歸我們，不過希望和平解決。這回中東各國可是歡迎啦，特別是一個阿聯，一個伊拉克，每天吹，說我們這個事情好。因為我們這一搞，美國人對他們那里的壓力就輕了。

我想可以公開告訴美國人民，緊張局勢比較對西方國家不利，對於美國不利。利在什麼地方呢？中東緊張局勢對於美國有什么利？對於英國有什么利？還是對於阿拉伯有利些，對於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愛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灣的緊張局勢究竟對誰有利些呢？比如對於我們國家，我們國家現在全體動員，如果說中東事件有三、四千萬人游行示威，開會這次大約搞個三億人口，使他們得到教育，得到鍛煉。這個事情對於各民主黨派的團結也好吧？各黨派有一個共同奋斗目标，這樣一來，過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氣的，受了批評的，也就消散一點吧？就慢慢這樣搞下去，七搞八搞，我們大家還不就是工人階級了？所以帝國主義自己製造出來的緊張局勢，結果反而對於反帝國主義的我們幾億人口有利。對於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各階級、各階層、政府，我看都有利。他們得想一想，美國總是不好，張牙舞爪。十三個航空母艦，就來了六個，其中有大到那麼大的，有什麼六萬五千噸的。說是要湊一百二十個船，第一個最強的艦隊。你再強一點也好，你把你那四個艦隊統統集中到這個地方我都歡迎。你那個東西橫直沒有用的，統統集中起來，你也上來不得。船的特點就在水里頭，不能上岸。你不過是在這個地方擺一擺，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無理。

### （三）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的講話——結束語

教育這個東西比較帶原則性，牽涉廣大的知識界，是一個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脫離勞動，現在要教育勞動相結合，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大體上有這樣幾條：一條是教育勞

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现在苏联对这个问题也想改革，他们正在搞一个文件，在那里酝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在那里作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

在财政方面，我找了一个材料：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今年起，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亿。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五年可以搞××亿。这个事情很可以注意。那八年的头一年，一九五〇年，只有六十五亿，可憐得很。第二年，一九五一年，一百三十三亿，增加了。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一百四十八亿。这两年都是一百亿以上。到五三年，就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到二百二十三亿。五四年二百六十五亿，五五年二百七十二亿，五六六年二百八十七亿。总而言之，这四年相当停滞，有所发展，都没有突破二百亿以上的，到三百亿。三百亿是去年，去年是三百一十亿。你看，以前搞了四年，都是二百几，去年一年就是三百一。今年可以搞到××亿。你看，由三百一，一跃进到了××。明年应该是××几或者××几亿吧？也不要××几，也不要××几，一下跃到××亿。我这说的是第三本帐，××亿有可能。去年三百一只有一年，

今年××亿也只有一年。××没有，××没有，明年一跳可以跳到××亿。是不是能够搞到，还要看，这是一种预计，或者还会更多一点。后年就会更多。五年××亿，平均每年××亿。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五〇年可憐得很，只有十一亿，五一年二十三亿，五二年四十四亿，五三年八十三亿，五四年九十一亿，五五年九十三亿，可憐。五六年不是搞“冒进”吗？由九十三亿一跃跃到一百四十八亿。说是搞“冒进”了，不是犯了错误吗？五七年就减少了一点，由五六年的五百亿减少到一百三十八亿，减少了十亿，所以成为“马鞍形”。今年是二百六十八亿，明年总应该就可以搞××亿。前面这八年，五〇、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只有四百九十二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有××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而那五年的五百亿办的那么多工厂，就浪费差不多一半，本来可以办两个，只办一个，时间本来只要一年的，要两年。那么明年这××亿，就可以当作××亿（等于一倍）来用，因为现在有了经验了。双反，破除迷信，打破了一些规章制度。这是两笔大帐。

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

还有一点是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

沒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上去了。搞土地改革，鎮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屬於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但是地方，他們除了这些之外，还抓了农业。認真抓农业，搞試驗田，是从去年冬季起。这一抓，就抓起来了。現在我們要轉过方向，人有兩支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講了个抓紧。什么叫抓？什么叫紧？抓而不紧，沒有抓起来，等于不抓，你拿烟也拿不到，拿餅干也拿不到，拿洋火也拿不到。抓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鋼鐵，一个机械，有了這兩門，万事大吉。鋼鐵是原材料，机械就是各种設備，包括挖煤炭和挖矿山的机械，开油田的鑽探机械，电力机械，建筑机械，化学机械，交通运输机械（无非是汽車、火車、輪船、飞机，我們坐飞机就是坐机器），还有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耕种机械，收割机械，农村用的运输机械，农村电气化用的电力机械。苦战三年，农村机械还不会那么多，在第×个五年計劃的后兩年可能基本上用机械武装起来。所以一是抓鋼鐵，二是抓机械。沒有鋼鐵，机械就沒有材料，就不能造机械。机械里头有个工作母机，什么矿山，什么煉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母机，无非是車、銑、磨、刨、鑽之类，这些东西是根本的。今年不是二万多台，一发展就是五万多台，現在又搞到八万多台。这就是指工作母机。明年不是搞××万台嗎？实际上明年爭取搞××万台，如果明年能搞××万台，后年再搞××万台，我們这个国家第二个五年計劃就要搞一百多万台机器。我們解放的时候，四九年只有八万台工作母机，还是破破爛爛都在內。今年年底有二十六

万台。从張之洞起，到今年搞二十六万台工作母机，而這二十六万台里蔣介石交給我們的遺產是八万台。二十六万台減八万台，我們这九年搞了十八万台。但是同志們，明年这一年就不是八万台了，也不是二十六万台了，而是××万台，一年××万台，后年搞××万台。苦战三年，明年××万，后年××万，××万台，連前头的二十六万台，是××万台。那个时候，我們跟美国人談判就神气一点了。

## 关于“宦乡論西方世界的破裂”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宦乡的論点是正确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勢。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当中，還沒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長，非一朝一夕。所謂西方團結是一句空話。團結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團結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彈下面要求他的大小次伴們向美国靠攏，交納貢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謂團結。这种形勢，勢必走向團結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們，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 給周世釗的一封信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惇元兄：

賜書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讀了高兴。

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賢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認識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觀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們，人事糾紛，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說，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都要經歷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經驗，临事而惧，陈之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認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問題，这点似乎同你說过。聰謂多聞多思，實謂实事求是。持之有恆，行之有素，总是比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別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講了这一大篇，无非是加一点油，添一点譖而已。

“坐地日行八万里”蔣竹如講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徑約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一四一六乘之約得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轉(即一天時間)里程。坐火車輪船汽車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買車票)，日行八万华里，問人这是旅行嗎？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沒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許多人都以为怪。巡天，即謂我們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內)每日每时都在銀河系里穿来穿去。銀河何也？河則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們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則可以无数。牛郎，晉人。血吸虫病，蠱病，俗名鼓脹病，周秦汉，累見書傳。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問瘟神情況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記錯了？)屬銀河系。这些解釋請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見，可

以辯論。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見也可吧！

## 在第一次郑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在沒有實現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兩面性。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們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 关于《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一書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这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旬主席在郑州所作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經濟問題》一書的重要講話的傳達紀要，仅就一个同志的記錄整理的，記錄很不完全，其中还会有記錯、不確切之处，印发給大家仅供学习参考——原稿注)

省委、地委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印象不深，应当結合中国实际研究。其中一、二、三章有許多值得注意的。这三章許多东西是正确的，有些地方可能是斯大林自己沒有搞清楚。如第一章中的客觀法則，計劃經濟怎样搞，只說了几句，沒有展开，或者他心目中苏联計劃經濟已反映客觀規

律。苏联在重工业、輕工业、农业問題上，对輕工业、农业不很重視，結果吃了亏。还有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長远利益結合的不好。主要是一条腿走路。同我們的計劃比較，究竟哪个更适合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还有一点，斯大林只看重講技术，講技术干部，只要干部，不要政治，不要羣众，这也是一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沒有注意輕工业，也是一条腿。重工业内部相互关系，也沒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把重工业突出，講鋼是基础，机械是心臟。我們提出，农业方面以糧为綱，工业方面以鋼为綱。我們提出以鋼为綱就有了原料，机械工业也就跟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問題，提出了客觀規律，但是沒有很好解答这个問題。

第二章講商品，第三章講价值規律。我相當贊成其中許多觀點。把生产分成兩大部类，說生产資料不是商品，值得研究。在中国农业上有很多生产資料还应是商品。我看他附的三封信，最后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錯誤的，表現很不放心和不相信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方面說生产資料归国家所有，一方面又談农民买不起，实际自己騙自己。国家对农民控制得很死。兩個过渡，斯大林都沒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和道路，这对斯大林是件很苦惱的事。

資本主义留下商品形式，我們暫时还要保留下來。商品交換，价值法則，在我們生产中不起調節作用。我們起調節作用的是計劃，是有計劃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帥。斯大林只談生产关系，不談上层建筑，对上层建筑与經濟基础的关系不談。中国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下放鍛煉，破除旧的規章制度，都屬於上层，都屬於意識形态。斯大林只談經濟，不談政治，虽然說忘我劳动，其实多作一小时也

不行，都不能忘我。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談。如果沒有共产主义的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妥当，結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說是馬克思講过的，是馬克思講过的我們可以不宣傳。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

資產阶级法权，表現为資產阶级法律教育。資產阶级法权思想，我們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現，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則，則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們也是資產阶级范疇。現在我們宣傳破除一切資產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們想回到資本主义，提倡資本主义，但絕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产主义。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驟，不能一步登天。象人民公社，一方面要发展自給的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交換。我們利用商品交換价值法則为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我們国家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去年生产糧食三万七千亿斤，而商品糧大約有八百至九百亿斤。糧食以外的經濟作物也不发达，如棉、麻。所以要有这个发展阶段。現在还有很多县，搞了吃饭不要錢，就发不了工資。河北就有三县。有一县是能发工資，但不多，三元、五元。所以还要发展生产，要发展除糧食以外能卖錢的东西。西安农业會議，对这点沒有十分注意。总之，我們是个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国家，而且又很多的进入了社会主义。我們要破除一部分資產阶级法权，但商品生产、商品交換，还要保留。現在有一种风气，觉得共产主义越早越好，有的提出三年五年就过渡到

共产主义，山东范县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是慢一点。

現在有些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雅罗申科就不喜欢经济学。我們現阶段，以至將來一个时期，要使公社物資調撥扩大，还要使商品生产扩大。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我們有些同志碰到商品、商品生产就犯誤会。資产阶级法权要破，天天破，如講資格，講等級，不講供給制的長處。……一九五三年我們把供給制改为薪金制，这种作法基本上是对的，我們讓步是必要的。但是有缺点，即等級我們也讓了步。結果一个时期鬧等級，經過整风，这个等級是降下来了。等級制度是父子关系，猫鼠关系，要天天破除。下放干部、搞試驗田，就是改变这种等級的办法。沒有这种改变就沒有大跃进。

城市人民公社中資产阶级可以入社，可以当社員，但資产阶级帽子可以不摘。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們提了二条：

(一)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現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贊成在兩种所有制中間划一条綫。似乎公社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兩种所有制。一种是鞍鋼式的全民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講，則社会主义建設还有什么用？斯大林划了綫，講了三个条件，这三个基本条件不坏（書六十頁）。1、增加社会产品。2、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將商品交換到产品交換，从交換价值到使用价值。这两条我們中国，第一扩大，努力增加产品，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第二小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提高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不愿划这二条綫的人，似乎認為我們已經到了全民所有制，这是不对的。斯大林提出的第三条是講的文化，全民发展体育和教育。为此，斯大林提出四个条件（第六十二頁）：A、六小时工作制，B、綜合技术教育，C、改善居民条件，D、增加工资——增加工资降低物价。这特別是要这些条件是好的，但缺少思想政治条件。

以上几条，基本是增加生产，有了极大丰富的产品，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就好解决了。要增加生产，就要多快好省，要多快好省，就要政治挂帅，四个并举。整风运动，冲破資产阶级法权思想，中国加上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则更加容易做到多快好省。

所謂全面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兩条：(1)社会的生产資料为全民所有，(2)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人民公社的性質。公社是我国社会結構的工农兵商学的結合的基层單位，在現在是基层行政組織。民兵是对外的，特別是对帝国主义的。公社是实行兩個过渡的最好組織形式，一是由社会主义目前到全面全民所有制，一是由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将来过渡完了，公社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機構。

## 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談話

### (一)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談話

做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相結合。这

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羣众路線的方法，否則搞不好。这次是不是潑李富春的冷水？計劃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不要挫伤羣众的积极性，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訓。地方也有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一書記是块块，分工的書記是条条，也要結合。第一書記要和工业書記結合。北戴河會議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觀主义。事非經過不知难。（总理插話：确非神密，并不簡單。××：鋼鐵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減一点对国家的計劃不会受影响。鋼、电、交按第二个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个方案。）

六号、七号开中央全会，要不要提綱挈領講一下？計劃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七月一日再定。粮食原来并没有計劃翻一番，开了几次会就提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統一。好的东西不要字数太多，老子一輩子只写了五千多字。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牽制很多，搞鋼必須搞煤、电等等，缺一环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牽制比較少一点。党、羣众、技术人員三結合。試驗田、高产是对人类的一大解放、人类对自然界的認識。三三制打破了許多保險系数。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

人民公社再討論兩天，作好修改。这次很多問題展开了，回答了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民兵和家庭問題，杜勒斯攻击我們，說我們是奴隶劳动，破坏了家庭。資本主义早破坏了家庭，金錢关系，父不認子，各人开解。我們現在是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工資差額略为展开一点，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些。認為农民

有平均主义傾向，但也不能过于悬殊，但也不能沒有差額。苏联的工資差額悬殊太大，我們不照样学。將來，这样一点工資算什么？十五元算什么？总得有个三十元、四十五元了，都提高到几十元，差別就沒有了，这是指的乡村。城市的差額还会更多一些，这是必要的。城市里不要砍掉黃炎培、梅蘭芳、教授的工資。將來社会产品丰富起来，低工資提起来，完全接近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講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問題，如何平均？由下長上去。

作风問題，以半天的时间談一下。現在的問題主要是強迫与报假。棗阳县一个文盲未扫除，報告說是消灭了。強迫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階級異已分子，一部分是蠢人。強迫命令的人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地都要开党代表大会，談談作风問題。

今年下半年出現了兩個大問題，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鋼为綱。大家有点紧张，現在搞了条例，心情就舒暢了。人民公社文件是从郑州會議搞起来的，有所准备。計劃會議是按条条搞的。华东現在走下坡路，过去沒有想那些条件，有煤炭也运不出来。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产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兩千斤。薯类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針，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較妥当。吃饭問題，究竟把話說滿好，还是留有余地好？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

不到三頓半飯？廣東下命令一天三頓吃的。山東的羣眾說，現在吃煎餅，明年春天怎麼辦？現在糧食摸不到底，是否現在少吃些，以後多吃些？各地議一議。

國際形勢。赫魯曉夫開記者招待會，在柏林問題上搞了一手。你不撤，我撤。赫魯曉夫也懂得了搞緊張局勢。我們也搞點緊張局勢，使西方要求我們不要緊張了。讓西方怕搞緊張局勢，對我們有利。中蘇會談公報發表以後，台灣就開緊急會議，其實會上沒有談一句台灣局勢問題。四國首腦會議不召開了，也說是受中國影響，其實會上也沒有說四國首腦會議的問題。如果出遠門，是不是安全？斯大林神經不健全，從前哪裏也不去。各種材料證明帝國主義採取守勢，一點攻勢也沒有了。杜勒斯十八日的談話說：“你們共產黨人搞人民公社不要出那個範圍，你們只管你們的事，不要管你們以外的事，我們就放心了。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杜勒斯說我們搞奴隸勞動，搞集權主義，說我們積累太多。他說總收入扣除工資，就是積累。他把這種積累就叫做資本。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是列寧的公式。好好看看杜勒斯十八日的講話。他承認我們的積累多，組織性強，哲學搞不贏我們。杜勒斯的談話調子低，戰爭邊緣不講了，實力地位不說了。杜勒斯比較有章程，是美國掌舵的。英國人老奸巨滑，美國人比較暴躁，英國人經常作戰略和戰術指導。杜勒斯講世界五大問題：民族主義，南北兩極，原子能，外層空間，共產主義。這個人是想問題的人。要看他的講話，一個字一個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世界秩序研究會議，三千七百萬教徒發出一封信，主張承認我們。杜勒斯說教會只要規定道德原則，細節不要管。

北戴河會議談的八個觀點靈不靈？還是靈的。北大西洋公約，向民族主義和本國共產主義進攻（重心是進攻中間地帶，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對社會主義陣營是防衛的，除非出了匈牙利事件。但我們在宣傳上是另一回事，還要說他是進攻的。不要自己被宣傳蒙蔽。李普曼寫了一篇文章，說不是進攻，但說服不了蘇聯人民。誰怕誰多一點？李普曼主張把印度扶持起來抵制我們，看來很怕我們，怕我們在亞洲、非洲爭取領導權，很怕我們經濟高潮。緊張局勢，歸根到底對我們有利。戴高樂出現，橫壟要出現，出現了，比較對法國無產階級不利。中東美軍早撤好還是晚撤好？只有一個多月就走得光光的，證明他們撤走。台灣打炮有好处，不然民兵不能組織這樣快。禁運、進聯合國、和、戰、打原子彈問題，比較對誰有利？怕好還是不怕好？橫起一條心，不怕反而好。在一起議一議就不怕鬼了。杜勒斯好戰。挨罵是假像，不是真像。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專人看參考資料。

△ 赫魯曉夫過于謹慎，過于不平衡，是鐵拐李，不是兩條腿走路。人民生活才二百億布，比我們稍高一點。重工業偏大，偏于中央，不重地方；偏于行政，缺乏羣眾路線。

这次會議，開得比較長一點，松一點。比較集中，主要只搞兩個文件。紙老虎問題，黨內外尚有許多人不了解。有人說既然是紙老虎，為什麼不打台灣，為什麼還要提出趕上和超過英國？我寫了一篇短文回答這個問題。是真又是假，暫時現象是真的，長遠來看是假的。我們從來說，戰術上要重視它，戰略上要藐視它。不但對階級鬥爭應當這樣，對自然鬥爭也應這樣。除四害、扫盲、綠化、血吸蟲，不是一年可以實現的，要幾年去搞才行。

## (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講話

(一)公報問題。西方可能四分五裂，看樣子會四分五裂，但是也還拿不准。歐洲大陸一個集團，對付英美，但內部矛盾重重。德法矛盾，英美也有矛盾，他們是又團結又斗争。斯大林分析資本主義內部要打仗。我們早已說過，一九四六年我們寫的文章，發明美中和蘇聯的中間地帶，爭奪中間地帶是主要的，為什麼不打中間地帶，先打蘇聯呢？以反共為名，去搞蚕食政策，對中間地帶侵略，引起中間地帶的反抗，有廣大中間地帶，他們走不過來。包括美、法、德、意，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他們的後方。歐、亞、非在鬧亂子，美國如何脫出身來打蘇聯？

剝削是剝削人，剝削人才能剝削地球，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財，把人都打死，占了它幹什麼？我想不出為什麼要打原子弹，還是常規武器。我們想，只要不打原子弹，德、法、意都贊成，許多國家就不怕美國。能不能訂個條約互相不使用？壟斷資本存在，不打仗是不行的，因為沒有原料，沒有市場。

公報中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帝國主義一定要四分五裂，而且自己要打仗。尼克松說：要搞經濟競賽，要把印度扶起來。印度如何能扶起來呢？西方是一股悲觀氣氛，我們是一股高興氣氛。四分五裂這句話要斟酌一下。四分五裂是真理，但一講，是否會引起他們警惕？可是又沒有辦法。美國在台灣要把自由主義分子擠進去。伊拉克很緊張，這幾天捕了一大批反革命，但是勝負還沒決定。主要是美、英、土耳其、伊朗在搞陰謀（卡塞姆為什麼解散工會？懷疑伊

拉克消息為什麼靈通）。

(二)三個文件，已定稿。辭職問題，“偶象”總要立一個，一個班要有一個班長，中央要一個第一書記。沒有微尘作為核心，就不會下雨。與其死了才亂，不如現在亂一下，反正有人在。沒有了核心是絕不行的，要鞏固一下。搞久了便就成為“偶象”，要破除比較難，這是長久立起來的一種心理狀態。也許以後職務可多可少，可上可下。實際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務。

五九年計劃搞兩個月再說，二月半再議一次。

人民公社如何？二月一日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或在北京，或在成都，或在上海。

香港報，罵蔣介石“倉惶辭廟，逃往台灣”。

人代會三月十五日開。

二月一日開會，除檢查兩個決議外，整頓國家機構是必要的，安排人代會報告，還有教育問題，人民公社再搞點內部指示。

人民公社對憲法有破壞沒有？例如政社合一問題，人代會沒有通過，憲法上沒有。憲法有許多過時了，但現在不改，超過美國后再搞個成文憲法。現在學美國，搞不成文憲法。美國是不成文憲法，一篇一篇湊起來的。

進入共產主義，需要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搞成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少則三、四年，是指第二個五年計劃；多則五、六年，是指第三個五年計劃。

(三)人民公社文件，還要修修补補，還要想一想，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時間修改，十八號發表公報和主席辭職問題，十九號發表人民公社決議。

主席辞职問題，如果还有疑問，还可再开一次電話會議，解釋解釋。

(四)北戴河會議，我犯一个錯誤。想了一千〇七十万吨鋼、人民公社、金門打炮三件事，別的事情沒有想。北戴河會議決議現在要改，那时是熱心，沒有把革命热情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武昌會議把兩者結合起來了。決議要改，兩條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陳炯明在東江和一个县的稅務局長湊股子，选举一个人當局長，抓兩个月一換。

还是兩句話：“輕重緩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羣”，橫聯是“政治挂帥”。

下午必須开一次会，出告示，要專政。省委書記要会做，无非是落后，已經落后了，再落后几年，有什么問題。做省委書記要全面，顧全大局。全国一盤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結合，还有矛盾，服从全国的利益。顧全大局是最高的品德，这种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凡不顧全大局的，就要吃亏。楊一辰就是不顧大局，想趁机而起，打倒周、陳等，想搞这一套。凡是想搞这一套的，都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有一帮人，不顧全大局。历史上一切不顧大局的人都沒有好下場，如楊一辰、高崗、羅章龍。

准备自己受了冤枉，还要顧全大局。楊一辰有多少馬列主義？一毫也沒有。

有些省穷得要命，再穷几十年也不要緊，实际上不会穷几十年。

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紅娘晚上站在外邊，并且挨打，为了什么？

## 在八屆六中全会上的講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講些意見，不是結論，決議就是這次會議的結論。

一、人民公社的出現，這是四月成都会議、五月黨代表大會沒有料到的。其實四月已在河南出現，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發現，北戴河會議作了決議。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種建設社會主義的形式，便於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於由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便於工農商學兵，規模大，人多，便於辦很多事。我們曾經說過，準備發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過於戰爭和黨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沒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沒料到，八月才作出決議，四個月的時間在全國搭起了架子，現在整頓組織。

二、保護勞動熱情問題。犯錯誤的干部，主要是強迫命令，講假話，以少報多，以多報少。以多報少危險不大，以少報多就很危險。一百斤報五十斤，不怕，本來是五十斤報一百斤就危險；主要的毛病在於不關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產。怎麼處理？犯錯誤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數。對於犯錯誤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採取耐心說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處分，作自我批評就夠了。大家議一議，不能以我一個人的意見，就作為結論。對於嚴重違法亂紀、脫離羣眾的干部，約佔縣、區、鄉干部的百分之二、三、四、五，到此為止。各地情況不同，應加以區別。對這一些人，應該予以

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做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間犯錯誤的人，方針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問題。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們採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講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說服我，拿出三張河网化地图，說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許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千到四千万吨鋼。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鋼能說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的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兩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哩！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說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鋼，那时也許說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时还不說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裝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說好，值得商量一下，因为報紙已在大宣傳。

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們考慮。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長一点，結果时间縮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們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說長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馬克思尝識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評我。

四、党内外某些爭論問題。圍繞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議論。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議論，有一大堆問題搞不清楚。一人一說，十人十說，沒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議論，大体上有几說：一說是性急一点，他們有冲天干勁，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紛紛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兩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決議的主要鋒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講的。就是說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沒有好处。有了这个決議，經過这个決議，經過几个星期 几个月，他們在实践中、辯論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統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們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們認為太急了，他們不是觀潮派、算賬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們有顧慮，恐怕我們跌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決議也可能

說服他們，因為我們並不那麼性急。這個決議主要鋒芒是對付性急的，也給了觀潮派、算賬派以答復。他們是不懷好意的，他們不懂得當前形勢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經成熟。

兩個過渡，如何過渡，這兩個月發生了這個問題。發生了很好，就給予答復。這個問題成都會議沒解決，鄭州會議作了些準備，經過一個月，已經成熟。共產主義分兩個階段，從馬克思講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寧十月革命到現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黨搞根據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國勝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說這個問題並不是不成熟的，應該說答復這個問題的條件是成熟了的。現在國內國外對這個問題議論甚多。杜勒斯也在議論，他說我們搞奴隸勞動，破壞家庭，說我們剝削太多了，積累太多，因而建設的速度快，他們剝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間階層、無產階級、共產黨人也都在議論紛紛。各國無產階級、外國同志出來為我們辯護，他們的根據就是北戴河會議和報紙上的消息。我們如不做答復，一大堆混亂思想就會蔓延開來，就會出現很多無政府狀態，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縣，縣管不了社，成為脫繩之馬，所以一方面反對太急，一方面答復這個問題。

五、研究政治經濟問題。在這幾個月內，讀一讀斯大林的《論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拿出幾個月時間，各省要組織一下。為了我們的事業，聯繫實際研究經濟理論問題，目前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實際意義。鄭州會議我曾經提出這個建議，我寫了一封信建議大家研究。

六、研究辯証法問題。鄭州會議時，不知是那位同志提出“大集體、小自由”，這個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

集體”，杜勒斯、黃炎培、榮毅仁都會歡迎的。

“要抓生產，又要抓生活，兩條腿走路是對立統一的學說，都是屬於辯証法範疇的。馬克思關於對立統一的學說。一九五八年在我國有很大的發展，例如：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工農業同時並舉，重工業與輕工業同時並舉，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小土羣與大洋羣，土法與洋法，幾個並舉；還有管理體制——中央統一領導和地方各級分級管理，從中央、省、地、縣、公社一直到生產隊，都給他一點權，完全無權是不利的。這幾種思想，在我們黨內已經確立了，這很好。小土羣、大洋羣也是並舉的。還有中洋羣，例如唐山、黃石港不是中嗎？有沒有小洋羣？也有。還有洋土結合羣。總之，複雜得很。這些事在社會主義陣營，有些國家認為是不合法的，不許可的。我們許可，在我們這裡是合法的。許可好還是不許可好？還要看幾年。但在我們這樣的國家中，啥也沒有，窮得要命，搞些小土羣也好嘛！專搞大的太單調。在農業中也是很複雜的，有高產、中產、低產同時存在，實行耕作“三三制”是羣眾的創造，北戴河會議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種糧食，三分之一休閒，三分之一種樹，這可能是農業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會主義制度方面，在社會主義階段，有兩種所有制同時存在，是對立又是結合，是對立的統一。集體所有制中包含了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質是集體所有制，並且包含有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說，中國提出集體所有制中包含有共產主義因素是對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允許組織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但在共產黨領

导下的国家中，應該也可以允許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長。斯大林沒有解决这个問題，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絕對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講成辯証法的发展？

郑州會議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現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辯証法的推广。武昌會議又提出实事求是，訂計劃又热又冷 要雄心很大 但又要用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決議，想解决一切問題也不可能。我看这个決議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會上发表。这和我們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較有根据，比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鋼的問題，明年搞三千万吨鋼，我也贊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問題，忧虑这些鋼誰用，沒有考慮到可能性的問題。后来又考慮到可能性的問題。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問題，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虛假的可能性，不是現實的可能性。現在，要把空氣壓縮一下，把盤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則超过嘛。現在要壓縮一下，不一定訂那么高，留有余地，讓羣眾的實踐去超过我們的計劃，这也是一个辯証法的問題。實踐，包括我們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羣眾的實踐在內。提的低，由實踐把它提高，這並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長，全世界从

古以来就沒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联系起来，在这个問題上不要搶先。現在有些县总是好搶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應該是鞍鋼、撫順、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象样子。有沒有可能也是問題。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識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鋼，我們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們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問題的。赫魯曉夫提出的七年計劃，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兩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應該，一个不可能。即使我們可能先进也不應該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寧的事业，我們都不是学习列寧嗎？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馬克思那里去請賞。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問題犯錯誤。要講辯証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辯証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問題。

七、郑州會議搞的十五年綱要，这次擋下沒有談。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經驗，都不能證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綱要，我們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來談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長期計劃。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長期計劃，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問題也許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會議沒有談，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軍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

风；二是官長下連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會議后，各級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經开得差不多了。訓練，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煉鋼、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軍队总是軍队，訓練是經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問題。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讀書，劳动搞出味道啦。如果很多人不想讀書就成了問題。成了問題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讀書。

十、兩种可能性問題。一种事物总有兩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兩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其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兩面，我們的決議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飯，有飯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認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的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來說，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趨勢是发展和巩固。我們的党也有兩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兩個中央，在長征中与張国焘分裂，高饒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經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團內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死亡一部分細胞，从小孩起就要死亡一部分細胞，这才有利于生長。如果没有死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死亡那不得了。死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說不識，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

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沒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講，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沒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饒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錯誤，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寧經常說：國家总有兩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們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兩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寧是不隱諱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們人民共和国也有兩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們手里沒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計，走为上計。他佔北京、上海、武汉，我們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時代。所以一方面我們要积极准备，大搞鋼鐵，搞机器，搞铁路，爭取三四年內搞几千万吨鋼，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們比現在更巩固。我們現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門打砲，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鋼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現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很弱的。在政治上我們是強國，在軍事裝備上和經濟上是弱國，因此我們面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強。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時間，就比較好了，就名符其实了。現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現在外国人吹的很大，許多報紙尽是大話。不要外国人一次，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鋼只有九百

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騙自己。糧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們講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們只怕沒有。有沒有，沒有查过，在座諸公都沒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計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講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別人講不爱听，我就到处講講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塔台，党分裂，脱离羣众，被美国佔領，国家灭掉，打游击。我們有一条馬克思主义的規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們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證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軍队变成兩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資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则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拿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禍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講的都是丧气話。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兩种可能性都談，沒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們好去报告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爭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沒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問題。这次要做个正式決議，希望同志們贊成。要求三天之內，省里开一次電話會

議，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邊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計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贊成，一部分人不贊成。羣众不了解，說大家干勁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講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爭取超美后才去見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敵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們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報紙都說明这一点。真正喪气的是帝国主义，他們爛、亂、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們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他們沒有变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資本主义时代是他們的好日子。我們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計到还有長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並且要估計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險，最反动的是壟斷資产阶级，大多数入是不愿打的。

## 对“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組 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建議將此件印发給全國一切大專學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閱讀，並討論一次，端正方向，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教授、講師、助教、研究人員，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業和文化科学事業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報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总支，也应發去，也應討論一次，請酌定。

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教研組党总支檢查了物理教研組支部的工作，并組織党员討論了对知識分子的政策。討論中暴露出以下問題：

(一) 認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識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為他們絕大多数都是資產阶级知識分子、剝削阶级，連团員助教也被認為是革命对象。

(二) 認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綫，在学校中提羣众路綫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認為提“發揮老教师的作用”，就会模糊阶级界限，放松斗争。

(三) 認为高級知識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針，他們摆开了陣勢向我們进攻，必須还击；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們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

(四) 認为現在党的威信和羣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現在工作忙，做统战工作就会妨碍大跃进，一切組織都应当換上党员来領導。

由于这些錯誤的認識，他們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錯誤的做法。該教研室主任刘紹唐（中左），一貫表現較好，但支部却認為他只能起反面教員的作用。編教学大綱时，讓他帶了几个落后的助教編，党团員背着他另編了一个，准备唱对台戏。刘表現非常积极，开夜車將教材編出来了，无可批判，党员却將他編的大綱丢在一边，只把党团員編的大綱交给羣众討論。

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时，党团員在小組會上說：“現在不搞共产主义是对資產阶级的退却”，“校長

說不降薪，是迁就高級知識分子，如果他們有覺悟，应自觉自愿降薪”，“这些人再不改造，应当送他們到养老院去。”

教研組的工作都由党支部包办了，根本不和教研組主任商量。党总支提出要調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这个支部想不通，認為如果不把这些人的威风打下去，党團員的积极性就調动不起来。党总支提出應发动羣众總結貫彻教育方針的經驗，支部也不愿意，說：“为什么要和革命对象一起总结經驗？”

清华大学党委最近已檢查糾正了这种錯誤作法。

##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象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講坏話，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兩個月。現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勁。总路綫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干勁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應該鼓足。……干勁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羣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勁。

現在搞了一年，已經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暫時現象？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象我們这样的国

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說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現在不进了。不論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請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謂工作方法，就是辯証法。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講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腦筋里記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績那方面挤得沒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問題。是形而上学还是辯証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問題，不把世界看成統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象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現象看問題，不从本質看問題；从形式看問題，不从內容看問題。第三，靜止地看問題，不从发展看問題；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內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質。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导北京大学問題，說是右派猖狂进攻，鬧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的講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駁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駁倒了。“内部参考”就說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書，則不如无書。武王伐紂，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現在我們講的書就是報紙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话要兼听。不管我們有多少缺点的“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話要兼听。不管我們有多少缺点的

几亿劳  
動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們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飯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

武昌講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頂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們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級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結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觀实践中才能見效。

我們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傳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兩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要加一些；加工工业減少一点；增加××亿投資、××万美元、×吨鋼材搞輕、化工业是对的。要宣傳、討論、发展这个办法。經濟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連鎖反应。要鑽进去，調查研究，发现問題，揭露問題，解决問題。不鑽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鑽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問題就是矛盾。許多所謂沒有問題，其实是有問題。要发现問題，認識問題，解决問題。《水滸傳》“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這個問題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問題，打了胜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問題是祝家庄內部情況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內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們打仗都調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現在搞建設，向自然作战，也要調查研究。搞建設我們沒有經驗，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沒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斤糧食，××担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額。糧食要搞××斤，只报××斤。不搞这么多不行，不然明年不好办。前年搞得早，去年剛好，今

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沒有？搞肥料，看報上還不錯。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爭三百億土方。今年我耽心肥料這一關。人患浮腫病，就是沒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腫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漚肥、綠肥、熏肥、人糞尿、牲口糞尿，以這些為主，切實搞一下。麥子要追肥、追水、多鋤。多鋤就是暫時割斷毛細管，減少水分的蒸發。今年搞××××億斤糧食，應該是按土、肥、水、種、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糧。水有了，應該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現在暫時不修改。聽說搞肥料所需的人工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個人民公社都要搞一個農具廠。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風一過，就不行了。要單獨搞一個農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氣象、土壤的，就是沒有研究農具的），收集、研究、設計、試制農具的學校。要挖這麼多土方，運这么多肥料，都用人工挑？沒有機械是不行的。“收割”應為“割收”。割、運、打、收，沒有機械，要人去割，那怎麼得了！

還有兩個問題談一下。有些人批評我們沒有大躍進。富裕中农當中有百分之三十，論調與地、富、反、壞、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見，口上不講就是了。對這個問題，武昌會議我也講過，我們有百分之五的人違法亂紀。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為黨為國的人，不能算進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內。對於幹部和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要保護。就是百分之五之內的人，也要區別對待，分別情節，進行教育，改正錯誤。如果把這個問題誇大化了是不好的。這個經驗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經，天天念。這是個別與一般。

大部分與小部分、部分與全體的關係問題。我們黨有幾十年的經驗，對於本來是好人的人，犯了一點錯誤就夸大起來，就會變成黑暗一片。列寧說，這種話本來說得對，只要略為說過了，就變了質。現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體的關係，缺点一列幾十條，就天昏地暗，一无是處。這一點必須警惕。在整社過程中，要讓羣眾把缺点說出來，首先要自我批評，一定要改正，然後講清楚缺点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係。在分析問題、處理問題中，一定要搞清一個或二、三個指頭的問題。當然這是指大多數而言，也有少數個別搞得很壞，一塌糊塗，但大多數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護積極性，否則就有“曹營之事不好辦”之感。個別真正犯了路線錯誤的人，不是一個指頭，而是爛了九個指頭，例外。結論一定要做得恰當，不然要犯錯誤。對民憤很大的要處罰，當然不一定每個人都槍斃。農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給予處罰是不好的，會影響羣眾。但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要堅決保護過關。這個問題，我們黨有幾十年的經驗，如羅章龍，此人現在在武漢當教授，我很熟。羅當時反對中央很厲害，否定中央，一無是處，就是他正確，自立中央。結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腳。還有立三路線，也講只有他對，別人都不對，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線也是一樣，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把別人說成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是狹隘的經驗論。還有張國燾路線，也是自立中央。編了劇本歌謠，打倒毛、周、張、博，自稱是列寧主義，國際路線，結果毀壞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兒子放在中山大學讀書，證明不是列寧主義。第二次王明路線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綱領，聲勢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

惑了許多人。这不是个別人的問題，他代表好多小資產階級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狀，說毛有三大罪狀：反国际路線；整風中強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檢討；搞宗派。武昌會議時，王明寫來一封信，比過去好些，講辭職了。高饒反黨集團，他們做絕了，太過分了，反對×、周，重點在×，說有兩個中心，兩個灘頭，有他們的綱領，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點，不及其余，把一點夸大成全部，結果毀滅了自己。沒有提過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這些事情還不算在內。歷史上有陳獨秀路線、羅章龍路線，兩次王明路線、張國燾路線、高饒反黨集團，……這些大事件與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六年反冒進程度不同，性質不同。……不論中國外國，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結果是否定了自己，毀滅了自己。對蔣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還是蔣介石好。但是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就不去，至于當總統，還是他好。最後，美國也可能不要台灣，把它當個毒瘤沾在他們身上，我們將計就計，只要他這個葫蘆挂在我們頭上，總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會起變化。給他飯吃，可以給他一點兵，讓他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做適當的估計，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結果，那是毀滅了自己。在目前批評缺點的時候，講到這段歷史，就是拿歷史教育我們的同志。

在南寧會議，提出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問題，把問題形象化，最能說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顧大局與不顧大局的問題，就是大局與小局、部分與全体的關係問題。

關於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問題，我不甚了解，

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觀符合客觀法則？列寧說，俄国的革命熱情與美國的求實精神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理論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質，是接近實際的東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普遍與具體是對立的統一。客觀規律在每一個國家因歷史條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觀法則要研究它，認識它，掌握它，熟練它。斯大林對這個問題講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農小，重大輕小，大大中小小。我們現在作翻案文章，從一九五六年開始創造工業（包括交通運輸）、農業兩方面的高漲。躍進，開始找到了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法則的門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後，人民的熱情起來了，開始看到經濟發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經過努力可以辦到的事情就要努力辦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辦到的就不辦，一定要他辦到就是主觀主義。主觀反映了客觀，就成了主觀能動性，不是主觀主義。主觀能動性有兩種：一種是脫離實際的，就是主觀主義；一種是符合客觀規律的，是符合實踐的主觀主義。凡是違反客觀規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貨脫節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險。

日本人說我們不是人口論，是入手論。我們有這麼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可能是基本適合的，至于具體數字多一點少一點，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證明是可以大躍進的，每年都可以大躍進，無非是多於一千万噸鋼或少於一千万噸鋼。蘇聯一九五八年增產四百萬噸鋼，是歷史上所沒有的，前年只增產了三百萬噸。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二十年中只增產一千四百萬噸，戰後十三年增產了三千七百萬噸，以後每年增加五百萬噸。我們與他們不同，我們

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說，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朝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現在我們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論搞了一个“鼓足干勁，力爭上游”，这两句話很好，成都會議发展成为总路綫。現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勁？要不要鼓足？要不要爭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質量）？前兩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質。

当然我們有缺点錯誤。抓了一面，忽視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輕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經營），运输失调，基本建設上馬太多，这些都是我們的缺点和錯誤。象小孩抓火一样，沒有經驗，摸了以后才知疼。我們搞經濟建設还是小孩，無經驗，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們还不熟。要正面承認这些缺点錯誤。有人寬慰我，成都会議不是提出劳逸結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沒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沒有抓生活，一定要 $\times$ 万人（得浮腫病，北京一人一兩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間、斗争中間才認識了客观实际、計劃、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朝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中，找到了門路（大跃进）。可能武昌會議的四大指标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鋼鐵、煤只拿到一月分（生产不大好）。要經過努力，可能轉化为现实性。經

过这次會議，經過努力，可能各方面的問題解决得更好。有了經驗，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諸葛亮变成了事前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沒有注意。一部分輕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經營、运输問題注意不够。一种是沒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調。这几个問題不作結論，当作一个問題，請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們的計劃、指标、社論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經驗。即使還沒有完成，只是經驗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詩，我贊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訓。……无經驗，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們的經驗就多了，不适合，我們就改，讓全世界罵一頓。我們总路綫也不能改，“降低干勁，力爭下游，少慢差費”地建設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現在我們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現代工业、现代农业、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計劃按比例发展？这个問題才开始接触，請同志們研究。

## 在第二次郑州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三月）

一九五八年，我們在各个战綫上取得了偉大成績。不論在思想政治战綫上，工业战綫上，农业战綫上，交通运輸业

戰線上，商業戰線上，文化教育衛生戰線上，國防戰線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別顯著的，是工業和農業方面有了一个偉大的躍進。一九五八年，在全國農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農村中原有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擴大了和提高了，並且開始帶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規模比農業合作社大得多，並且實現了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的結合，這就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和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廣大的農民，尤其是貧農和下中農，對於人民公社表現了熱烈的歡迎。廣大幹部在人民公社運動中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們表現了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的極大的積極性，這是非常寶貴的，沒有他們的這種積極性，要取得這樣偉大的成績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的工作中，不但有偉大的成績，也有一些缺點。在一個新的象人民公社這樣的缺乏經驗的前無古人的幾億人民的社會運動中，人民和他們的領導者們都只能從他們的實踐中逐步地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加深他們的認識，揭露事物的矛盾，解決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的成績，克服工作中的缺點。誰要說一個廣大的社會運動能夠完全沒有缺點，那他就不過是一個空想家，或者是一個觀潮派，算賬派，或者簡直是敵對分子。我們的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有些人懷疑或者否定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懷疑或者否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這種觀點顯然是完全錯誤的。

人民公社現在正在進行整頓巩固工作，就是說整社，已經或者正在辯論一九五八年有無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有無優越性兩個問題。各級黨委在整社工作中，按照六中全會的方針，

採取了首先肯定大躍進的成績，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然後才指出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這種次序，這種作法是完全恰當的。這樣作，可以保護廣大幹部和羣眾的積極性。就幹部來說，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好的，都是應當加以堅決保護的。

現在我來說一點人民公社的問題。我認為人民公社有一個矛盾，一個可以說相當嚴重的矛盾，還沒有被許多同志所認識，它的性質沒有被揭露，因而沒有被解決。而這個矛盾我認為必須迅速加以解決，才有利于調動廣大人民羣眾更高的積極性，才有利于改善我們和基層幹部的關係。這主要是縣委、公社黨委和基層幹部之間的關係。究竟什麼樣的一種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種相當緊張的狀態。突出的現象是一九五八年農業大丰收以後，糧食棉花油料等等農產品的收購至今還有一部分沒有完成任務。再則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無不及。同志們，請你們想一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麼地方。這裏面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的應當從我們對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認識和我們所採取的政策方面去尋找答案。

農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個發展過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馬上就可以消灭生產隊的所有制呢？我這是說的生產隊，有些地方是生產小組即管理區，總之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現在有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

社內，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資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誤認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誤認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价值法則，否認等价交换。因此，他們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好大恐慌。这就是我們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問題。

公社成立了，我們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決議和六中全会決議所說。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們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們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問題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錯誤的，那就是右傾机会主义的。問題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級所有制之間的区别，把三級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級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單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強大的經濟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問題是必須承認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讓步的問題。在沒有實現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們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兩面性，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

脱离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們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輝燦爛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潤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資，其发展將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資問題，我建議国家在十五年内向公社投資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認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公社有了強大的經濟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時間大約需要兩個五年計劃。急了不行，欲速則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決議所說的，將需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时间。然后，再經過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決議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須經過的发展阶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們还不認識這個問題。这样，下面的同志在

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級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队，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引起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從一九五八秋收以後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一方面，中央、省、地、縣、社五級（如果加上管理區就是六級）黨委大批評生產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瞞產私分，另一方面生產隊、生產小隊却几乎普遍地瞞產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以保卫他們的產品。我認為，產品本來有餘，應該向國家交售而不交售的這種本位主義確實是有，犯本位主義的黨員干部是應該受到批評的。但是有很多情況並不能稱之為本位主義。即使本位主義屬實，應該加以批評，在實行這種批評之前，我們也必須首先檢查和糾正自己的兩種傾向，即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人的收入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制，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力，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同時許多公社和縣的生產隊抽取的積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費又包括很大的浪費（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員不勞而食或半勞而食，甚至還有脫產文工團）。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這當然是不對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產隊和廣大社員的不滿。

目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向廣大干部講清道理，經過充分的醞釀和討論，使他們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後我們和他們

一起共同妥善地堅決地糾正這些傾向，克服平均主義，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集中於公社一級的狀態。公社在統一決定分配的時候，要承認隊和隊，社員和社員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別。窮隊和富隊的伙食和工資應當有所不同，工資應當實行死級活評，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並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隊、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公社的積累應當適合情況，不要太高。必須堅決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費現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種確實存在於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義，鞏固公社制度。這樣做了以後，公社一級的權力並不是很小，仍然是相當大的，公社一級領導機關並不是沒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情，並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其中有各種不同情況。有些是應當歸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業所需要的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鍋碗筷等。有些是不應當歸社而歸了社的，如鷄鴨和部分的豬歸社而未作價。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當然，這裏面不包括公共積累、集體福利，經全體社員同意和上級黨組織批准的某些統一分配辦法，如糧食供給制等，這些都不屬於無償占有的性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看看我們的歷史吧。我們只是無償剝奪了日德意帝國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

糧食等生活資料。所有這些都不是侵佔別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剝奪的人都是不勞而獲的。对于民族資产阶级的生产資料，我們沒有采取无偿剝奪的办法，而是实行贖买政策。因为他們虽然是剝削者，但是他們曾經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現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們采取贖买政策，就使我們在社会上取得主动，經濟上也有利。同志們，我們对于剝削阶级的政策向是如此，那么，我們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們指出這一点，是为了說明勉強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調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羣众中間去提倡算旧賬。相反我們認為旧賬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較穷的社、較穷的队和較穷的戶，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顧和国家的支持，自立更生为主，爭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輔，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擺脫目前的比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別人便宜来解决問題。我們穷人，就是說，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貧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鷄鳴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潘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們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們的世界，將我們現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設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漁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員必須加以縮減。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問題。爭人効，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須按农业、工业、运

輸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統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級工业企业都必須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須減下来。行政人員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業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們必須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統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盤棋。否則所謂一盤棋，实际上只是半盤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盤棋。一般說來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規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的限度，并且向羣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羣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儉办社的方針，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經驗，今后必须严格規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加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內不要宣傳粮食問題“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員，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議各級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員，少則一个月，多則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經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們同广大羣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說的方針和办法，我認為，我們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

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經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我們坚决要求繼續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觀潮派、算賬派所能推翻的。我們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偉大的成績，广大羣众是亲眼看到的。問題只是我們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問題，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沒有更早地作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級干部沒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說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們向广大羣众公开說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時間內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們手里，广大羣众就一定会同我們站在一起。必須估計到，一方面那些觀潮派、算賬派將会出来譏笑我們；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將会进行破坏。但是，我們要告訴干部和羣众，当着这些情况出現的时候，对于我們絲毫沒有什么可怕。我們應該沉得住气，在一段時間內，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頂住，讓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們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羣众一定会很快地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們將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敵对分子的进攻。經過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們同羣众的团结將会更加紧密。在偉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暢，更加充滿干勁。我們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們的。

## 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這几个月，从去年八月起，現在是四月，这八个月里头出了兩件事，都跟我們有关。一个是台灣問題，一个是西藏問題。去年八月大鬧台灣，現在大鬧西藏。我們就有这两块地方沒改革。西藏是陆地，有公路，可以用車子走。西藏又沒有任何一个国家跟它訂立台灣那样的條約，我們空軍可以去，陸軍也可以去。而台灣的性質就不同了，台灣跟美国人訂了條約。去年美国人在中东鬧得混不下去，中东事件，搞得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以及那許多美国人都神魂不安，睡不着觉。联合国通过叫他撤兵的第三天，我們就打炮。那里告一段落，这里就跟着来，美国人也就跟着来，吓得屁滾尿流。从美国西海岸調兵，还从地中海調一个艦队到台灣海峽集中。一时候他摸不到我的底。杜勒斯后头講，这是他們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集中。在一个地点集中这么多，比如，單是航空母艦，美国一共有十二条，这回集中了六条，集中了一半。其它的軍艦很多。拚命調，生怕我們把金門、馬祖、台灣夺回来。蒋介石那个时候慌得一塌糊涂，就准备搬家，有一个經濟部确实搬到乡下去了。八月二十三日一打炮，当天（或者是第二天）美国就下决心調兵。这是八月。九月一个月，到了十月，他就看清了，馬上撤回去了，回西海岸，回日本，回菲律宾。地中海的，因为路远，剛剛調來，剛剛到，到馬尼拉修理修理，馬上又回去，手忙脚乱。結果就是十一月四